



□郑恩兵

史书是指对过往纷繁复杂的人与事,经过书写者理性和感性过滤,犹如从蚕茧中抽丝,去伪存真,把历史的原貌尽可能地还原给后来者,由此不难判断,其核心价值为真实和中正。写史者需要具备两个根本素质,一是精准的选择力,二是中正的写作态度,从渐欲迷人眼的乱花中,准确、公允、理性地筛选入史的材料是作史的必备功夫,功夫的强弱决定着文本好坏的走向。

写史不易,写当代史更难,便是由于时间跨度相对短暂、集中,所写的人与事存在众多的当事人和见证者,孰是孰非难以有中正的判断。相较其他领域,河北的影视史写作更是难上加难,究其原因,主要有三:一是河北的电影艺术发展基本与新中国发展同步,电视业发展到了改革开放伊始才露端倪,在如此近距离的时间、空间中,还原历史真实,中正地取舍所要入史的人与事,是极其困难的,需要作者具有独特而敏锐的眼光。二是依据的研究材料稀缺,河北相对于其他影视业发展较快的省市,人才短板效应更加明显,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。三是书写者既要熟悉影视专业,还要具备过硬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学术研究功底。

汪帆先生具有“吃螃蟹者”的勇气,作为一个把近乎一生的青春、才智奉献给热爱的影视业的学者,他和胡景敏、郭学军两位青年学者在2019年主编出版了《河北艺术史·影视卷》。对于撰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在预料之中,但是凭借其自身具有的韧性和胆识,特别是对影视业的热爱,让此书不失真实和中正,而世一年来,褒扬之声不断,批评之声寥寥,便是明证。

《河北艺术史·影视卷》是成功的,作者秉承了书写历史真实和中正的传统,其敢为天下先的精神,细致入微的细节把握,合理的宏观架构,自然流畅的叙述言语,是此书品质的重要保证。

研究贵在创新,贵在开拓,贵在为后继者点亮引路明灯。开创性是此书最应该称道的价值所在。河北影视业发展的艰辛与辉煌、经验和得失,如果无人回顾总结,那么未来的繁荣和发展就是水中花、镜中月。此书弥补了长久以来河北影视业的这一缺憾,第一次全面而详尽地梳理和展示了河北影视业的点点滴滴,为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基础资料,为河北影视业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根基。

注重细节的叙述是此书成功的重要推手。《河北艺术史·影视卷》处处投射出细节的力量,在论述《小兵张嘎》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《远山姐弟》《周恩来的四个昼夜》《大唐名相》《先遣连》《当家的女人》等影视作品时,作者回避了宏观的叙事语言,切入作品本体,细致入微地对作品的人物事件娓娓道来,细密而动情的细节不断累积着厚度和温度,整部书由此而变得具体、生动,富有质感。

独具匠心的形式是该书的重要特色。一部优秀的作品是由优秀的内容和优秀的形式共同完成的,缺乏优秀内容的作品是一副空皮囊,好看而缺失灵魂,没有优秀形式的作品是一个杂货铺,丰富有余而观感不足。此书的架构开放而缜密,把宏观与微观、抽象与具体和叙事与列表完美地融合于一个整体,宏观地把握了整个河北影视发展的脉络,井然有序地完成了对重要影视作品的叙事,具体入微地陈列了几乎全部关于河北影视发展的事件,使读者对河北影视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。

河北的影视发展是一个囊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和人才的综合性命题,单凭一己之力,一部著作作为河北影视业的繁荣找到全部合理的答案,是极其困难的。为此,《河北艺术史·影视卷》在“破”的成分上要多于“立”的成分,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把遮蔽河北影视业发展的杂芜加以梳理和清除,掘开一个进入的缺口,有利于河北影视业健康繁荣发展。然而,此书不是不食人间烟火、远离现实的理论冥想,而是一部以个体经验为依托,把理论融入实践的书,在散发理论探究的深刻幽光的背后,弥漫着现实生活的气息和对影视艺术内蕴的真切感悟。

《河北艺术史·影视卷》是一本十分“厚实”的书,是一本深入理论前沿、切入社会焦点的书,具有文化本体论和实践论的双重价值和意义,为河北影视界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。这还是一本理性的深刻与感性的跃动相互交织的书,对于河北影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,无疑是一本富有参考价值的重要理论著作,对于一般的读者也不失为一本可读的书,因为它可感、有趣,充满了生活切实的经验和智慧。

# 以新时代的艺术笔墨展现中国精神

## ——浅议抗疫美术作品的现实意义

□董培升

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美术表现形式是不同的,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,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特色和人文思想,彰显着绘画特有的吸引力和生命力。

从古至今,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主流画风,都有自己独立的风格。盛唐雄浑壮丽,取材广泛、内容丰富;晚唐之画,虽画风清洒却渐薄;宋朝将“写意”发挥到极致;元代承上启下,开创了文人画时代;明代文人水墨画复兴,出现吴门画派和松江画派等代表画家;清代宫廷画复兴,绘画商品化兴起,西洋画传入。这些都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特色以及创新。傅抱石曾说:“思想变了,笔墨就不得不变。笔墨不仅仅是对画家生活、感情的反映,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反映,时代变化了,思想也变了,笔墨就应反映新的时代,歌颂新的时代精神和生活。”

创造新的绘画语言固然重要,但前提是表现新题材的需要,以当代生活为创作的源泉和素材,研究和审视环境,深入地体验与思考时代,书写特定环境的个性化体验,而不是落入为创

新而创新的形式圈套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河北美术家以燕赵慷慨悲歌之精神,以无限创作欲望和激情投入抗疫题材创作,脱颖而出出一批优秀美术作品,汇聚河北美术界抗击疫情的强大精神力量。这不仅是河北美术家在寻求自我突破的机会,也是具有特定现实意义的艺术尝试,让每一位艺术家都发现了绘画在表现时代上的新机遇。

面对疫情的冲击与挑战,赵贵德、祁海峰创作了《朝圣者》《戮力同心》《昨日来风》等作品,在他们的带领下,河北各县市县美协也发挥“文艺轻骑兵”精神,一大批美术作品相继面世,呈现出百花竞放的态势。他们以武汉为聚焦点,绘画对象既有钟南山、李兰娟等人,也把最核心的故事笔触伸向了普通的医护人员、解放军战士、一线志愿者,将他们的悲喜冷暖放在最突出的位置,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也书写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。

这些作品视角独特,注重细节,比如《面孔》《别样的喷香》《守望》《天使之爱》《写上你的名字》《仁心》《最美医生》等,将最能感人肺腑的瞬间定

格,热情刻画出特殊环境下的情感世界和愿望,体现了友好、仁爱、合作的精神;《英雄无畏》《誓言》《勇往直前》《中国长城》《无畏的行者》《挺进湖北》等,关注抗击疫情中青春与生命的壮怀激烈,记录下在一线抗疫救死扶伤的勇士,展现了医务工作者大无畏的献身精神;表现全民防疫抗疫的作品《出发前》《期待曙光》《山村防疫》《联防联控守护家园》《疫情就是命令》《在家》《静待》等,体现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,体现了中国人民巨大的凝聚力,也展现了普通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;《鏖战雷神山》《决战火山》《聚力》《逆行必胜》体现了解放军战士“若有战,召必回”的风采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。还有漫画和海报,以更快捷更明白晓畅更容易让人接受的艺术表达方式,强调国家对生命的敬畏和保护,劝诫人们不要过度紧张焦虑,也表达了对患难者的痛心与悲悯。

画家们用手中的笔墨记录感人的瞬间,讴歌抗疫英雄,致敬人间大爱,共谱爱的赞歌。我们从这些有情怀、有担当、有深度、有温度、有力量的艺术作品中,看到了白衣战士的奋不顾身、逆风而行,看到了一线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和无数英雄挺身而出,照亮前路。

这些抗疫美术作品,没有过去“高、大、全”的生硬表现方式,而是关注磨难、关注人性、关注生命本体,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拉近,从普通人的生活出发,在看似日常琐事之中,找寻中华民族蕴藏的力量,找寻齐心协力联防联控、团结制胜的典型场景,充分发扬伟大的中国精神,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精神力量。

艺术家从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灾难,当代画家应该用画笔记录并见证勇敢的“逆行者”,展现抗疫中的人间大爱和最可爱的人。如果美术作品离开了特定环境就不再“耐看”,那么只能说明其本身艺术水准不够。同时,美术创作与时代、环境的关系不能仅仅体现为对时代与环境的直接对应,还应该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求索,保持其独特的一份“清醒”,就

是以大美精神弘扬大爱情怀,为全社会加油鼓气,以新时代的艺术笔墨展现中国精神风范。

无论是面对疫情的挑战积极应对,还是默默地执着于艺术个性的锤炼,二者都要选择正能量、有时代感、接近生活的题材,逐步形成中国美术的特色表达方式,以其独具的精神性和创造性为时代代言。当代艺术家创作的抗疫美术作品要反映中国人的审美追求,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,最终汇成更广阔宏大的长卷。

疫情不是一次战斗,而是一场长时间的战役,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。这一特定时期的美术创作在高扬理想主义旗帜,重建精神信仰、价值秩序、道德传统的同时,拓展着美术描绘和表现的疆域,不只提供观感的审美,还应唤起城市发展中人性的悲悯情怀,表达人类情感和共同体意识,让世界见证中国精神、中国力量。

“笔墨当随时代”,但也应看到,当下美术界,绘画艺术有日趋程式化、技术化的不良取向,画家本身的修为、文化、认知和品位受到商业化污染,出现了一些抄袭、模仿的作品,同质化日益严重,这些值得警醒。

# 大与小之间 ——评刘厦散文集《遇见生命》

□郭文岭

河北作家刘厦的散文,很多时候是从她的窗子和她的轮椅出发,一路兜兜转转,山重水复,丰饶而辽阔。

刘厦一岁确诊为先天性脊髓肌萎缩症,大部分时间坐在轮椅上,在自家的一扇窗前读书、思考、写作。她与外部世界的对视,凭借的就是这扇窗子。她通过语音输入软件写作,“带着文学走在残疾的路上”,身体的局限,限制了她观察世界的客观方位和视角,但身体的局限,却不能限制一颗丰富而自由的灵魂。她身边的那扇窗子,也因着她的内心力量而无限打开。

散文集《遇见生命》(华夏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)中,刘厦多选择内视角,进行笔锋向内的“疼痛的切割”。一个被从“常规状态”剥离出来的生命,其敏感和尖锐,自尊和自卑,不甘和宽和,对于生命局限的挣扎和挣脱,对于父母的体恤和担忧,通过《关于母亲的错过》《留在心中的对不起》《路过另一个我》等文章,以坦诚、沉静的文字呈现。她与姐姐、母亲之间,多次探究生死问题。母亲既担心两个女儿死在自己之前,按

老规矩不能进入祖坟而只能葬尸荒野,更害怕她们死在自己身后而失去照顾。而作者,眼见得母亲一天老似一天,甚而患上哮喘病,“对我们的爱也改变着容颜”。面对人世间的幸与不幸,面对命运不公道的安排,作者的叙述情感总是克制的,静水流深,平静而开阔。刘厦说,她“只愿发出最真实的声音”,属于个体的、独特的声音。她认为,只有真的,才是美的,才是善的。她用生命体恤生命的艰难、人性的多棱,她以勇敢和自省对抗人生的苦难,打捞生命旅途中的光亮,忠实践行着自己的美学观。

《大与小之间》是散文集中十分重要、独特的一篇,它不仅是一个作家襟怀的剖露、生命的独白,也是她关于“角度”的创作论。面对大千世界熙熙攘攘的人流,她把自己的小世界,定义为一个“砖缝”,把自己比作“砖缝里的一只虫子”,接着,笔锋一转,她认为那些身处“广阔”天地者面对未知的“砖缝”,也会因“角度的局限”而认知苍白。“我这只小虫在砖缝里,自有一番景象,我看到的是从砖缝向外望出去的世界,而砖缝只是我的一个角度。而且我还



会因为这里的安静,而看见和听见更多这个角度以外不能看到和听到的东西,这些东西是我的,这些东西是独特的,这些东西自有它的丰富。”

刘厦的确是懂得经营“角度”和善于经营“角度”的高手。《窗口》《秋风中的长椅》《听老师说》,这些篇章无一不是“角度”的佳构。坐在窗口,她用卓异于常人的眼光体察人情、体察世相。在窗口的中间、左侧、右侧,在窗口的不同时间、不同季节,她看到了不同的世间风景。她的目光从窗口出发,走过人心的繁华和荒凉,也看见了

自己的全部心事。在窗口经年累月的张望里,获得了细腻,获得了勇敢,也获得了她与窗口之间一种精神的恒久依存。

刘厦文学创作的角度很小,我却跟着她的视角走过了生命的万水千山。她所呈现的,是“微小的世界”,又是“无限的世界”,以一颗勇敢的、颖悟的心,她亲近了“小”中的一切,理解了“小”中的一切。她总是“把角度调整好,把打捞信息的网眼编织得更精密”“去唤醒内心更细微更敏感的触角”,去欣赏那个小的世界。在《轮椅老了》这篇中,一把本无生命的冰冷的轮椅,作者却因为它与它生命相通而满怀感恩,由此一笔荡开,省视时间里的无常和离别。《岁月的遗物》,以一枚遗落在墙上的钉子作为视点,回眸日子细节,深入琐屑的生活肌理,疼痛而温暖。从小切口打开深入的抒写通道,别具匠心。

无论在生活中,还是在创作上,刘厦在别人无从体会的疼痛经历中,学会了热爱并营造自己的“小角度”、自己的砖缝,她也在不断地尝试走出和突围。《走进另一个夜》,在凌晨以后,坐着轮椅,走出家门,来到阒无一人的街上,这个小小的尝试,

让她发现了“生活的背面”。她走出自己的小屋,走出小小院落,在母亲陪伴下,走进大学校园,成为一名旁听的学生,《出发》《课堂笔记》《这里与那里》《熟悉与陌生》《取快递的路上》《国培大厦》等文本,就是她的“大学志”。这些文字,同样记录了作者心灵的挣扎和开释,有见地,有批判,有感动,闪烁着青春的美质和光华。

思辨性,是刘厦散文的珍贵特质。比如《大与小之间》,几乎没有叙述,而直接进入思辨。“有人曾质疑我:你每天都待在家里,没有生活,如何写作?这让我想起史铁生面对类似问题时的回答:难道你觉得我没有活着吗?”她思想的刀锋,直接劈入“残疾”这个现实,直面生命之局限、亲情之伤痛。冥想、思考,本该是生命应有的状态之一,而在普遍的快节奏中,我们很多人放弃了冥想,放弃了思考,从而也丧失了一个察世和自察的角度。

读刘厦的散文,跟从她的文字以另外一种视角打量社会人生,时而被她的犀利击中,时而被她的疼痛击中,进入另外一个纬度的生命思考。这或许是阅读刘厦散文更重要的收获。

# 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——读黑陶《中国册页》

□胡忠伟

黑陶的《中国册页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)为我们展示了一曲行进在当今中国辽阔大地的如歌诗行。

土耳其作家奥尔罕·帕慕克说:“中国之辽阔之巨大感染了我。”黑陶把这句话印在了书封上,显然,他很认同这一点。宏观壮丽的山河风景,深邃博大的往昔历史,灼热复杂的当代现实,给了他巨大的力量,促使他行走在中国大地上,潜游于故国深处,以汉字之美,书写新散文的独特景观。黑陶以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的极简方式,行走、注目,凝视,探望,深思,那些苍莽的山野、幽暗的城镇、淳朴的民风,以及古老事物的种种独特样貌……在他的笔下复活,并焕发出勃勃生机和诗意的光芒。

这些年来,黑陶不停地行走,走过了一个省城,穿过了一条条河流,跨越了一座座山

脉,他以一个作家深邃辽阔的感知和敏锐,用情用力用心书写着脚下的土地,以及在这块土地上耕作劳碌的人们,字字句句,显示着一个作家的担当和情怀。

在云南中部的哀牢山深处,有着让他念念不忘的神秘的苦聪人。在云南,苦聪人大致有3万多人,封闭的环境,原始的林木,苦聪人的生活简单而清苦,他们待客的热情,散发着人性深处的善良和真诚,给人印象深刻。黑陶写道:“在一座苦聪山寨里,我自认为倾听并触摸了这支神秘部落内心的声音。”从苦聪人简陋乐器的演奏声里,“我懂得了什么是人世的忧伤,一种平静的、本质的忧伤。”

哀牢山的每一座山峰,每一株植被,每一座建筑,每一个面庞,都那么原始,那么清新,沐浴在磅礴的山气之中,给人以涤荡心灵油气的快慰。纷繁纷扰的世界,此刻得到了简化,简化为眼前的山影、水声、萤火虫的光和夜坐的人,在这里,我们能听



到夜的清晰的心跳。什么是“物我合一”,这就是。在深山荒野之地,人与山水自然地融合相依,深切濡染,才使得疲于奔命的现代人,心中的执念和身上的浊气荡然无存,才会进入“无我之境”,才会“看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情溢于海”。黑陶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,

他深情注视过每一块土地,在瞩目于自然山水、名胜风物的同时,他更多地观察、体证着人生。李白、苏东坡、萧红……这些光辉夺目的名字,让黑陶的书写走进了生命,增添了人性之光、人性之美。

在萧红故居,黑陶以电影蒙太奇的手法,梳理了萧红短促而辉煌的一生。在他看来,萧红的一生,是在“做着自由落体运动”,人世的冷暖,情感的纠缠,文人的怯懦和执拗,与动荡不安的大时代急剧摩擦,诞生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颗颗珍珠般的倔强火星,《生死场》《呼兰河传》等都是后来者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。萧红弥留之际的遗言“身先死,不甘,不甘”,更叫人感同身受、欲哭无泪。

在安徽当涂李白墓前,黑陶的祭拜,不是单纯的发思古之幽情,还有接续传承文化的血脉,那些源源不断、滚滚而来的汉语,古老、简洁、神性,以滋润手中之笔,用散文的样态,寻

嗅一个人血液中的生命密码和气息。

“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。”黑陶的散文,有着清晰的反省意识,面对散文创作的小众和低迷,他有自己的探索 and 追求。黑陶,生长于南方宜兴,长江丰沛的水之灵气,熏陶了他的诗情,但他不囿于地域的限制,在他的身上,继承了父母那一代人面对生存的韧性和憨厚。他沉潜地写作,以赤诚的文学情怀,坚持不懈,精益求精,以汉语语言之美,化解了南北风俗的隔膜,让我们“通感”在一起。

黑陶独特的书写,让文字更加辽阔,写出了人人心中都有的经典情感。他的散文,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打磨,更加成熟、老练。如果说,他早期的《泥与焰》如动人的音符,轻扣读者心扉,《漆蓝书简——书写被遮蔽的江南》如缕缕乡愁,魂牵梦绕,那么这一本《中国册页》也已扬帆起航,向着更高更远的彼岸出发了。